



大鳳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80后』写作

与中国梦

黄平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火凤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80后』写作

与中国梦

黄平／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PUBLISHING MEDIA GROUP
BEIYUE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80后”写作与中国梦 / 黄平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

(火凤凰新批评文丛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7-5378-4340-9

I. ①8…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0345号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h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248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340-9

定 价: 36.00元

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

001

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

“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十年前曾经在出版界发生过影响的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谢绝他的这番好意。于是就有了这一套青年批评家的丛书。

我为此又特意翻阅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以外，还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写的序言。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徐俊西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里所指的“他们”，就是我和王晓明两个策划者，这里所说的“宗旨”，肯定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但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在哪篇文章

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原先记忆里似乎为这套文丛写过一个卷头语，但现在翻阅一遍也没有找到，也许是我曾经写了，后来没有用上，只是给徐老师写序时做了参考。所以，徐老师文章里打了引号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论为我们当时筹办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多种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整个文化工作在经济上是阔气多了，高校系统拨了大量的经费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各种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学术著作的出版补贴。所以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要出一本书并不困难，但真正的困难还是存在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前一本文艺批评的著作能否产生它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青年批评家的专业思想以及价值观。

002

1980年代，文艺批评是显学，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艺批评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时整个文学艺术正处于一个逐渐摆脱政治体制制约，开始自觉、自主、自在的审美阶段。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内在自觉，自主是指创作主体独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接受检验、寻求合理生存的社会效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变，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人们在主观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转变中的文艺创作需要理论支撑才能显现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论热潮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形势的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一批年轻人懂外语，面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引进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消解原来一元化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戒律，与文艺创作互相呼应，对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文艺创作给以及时的解读。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演变》的文章，从“五四”前后谈到当下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汇的可能性。那时我读书并不多，论述也有点勉强，学术性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间引起过激烈反响。有一个朋友说，那不是你的文章写得好，而是他们（指作家们）需要你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这个朋友说得对，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这

样的批评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可以成为畅销书，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种文艺创作发展的需要，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大学生教师逐渐取代了原来作协的文艺官员、核心报刊的主编。本来文艺批评应该有更大气象产生，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气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学院里从事批评的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双重压力。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在于主观上，因为学院批评与政治权力保持相对距离，在主观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客观上却遭遇了市场的挑战。出版业的萧条和倒退，迫使原先构建的批评家工作平台纷纷倒闭或者转向，出版人仿佛在惊涛骇浪里行舟，随时都有翻船的恐惧。不赚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文艺批评论文集，自然无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学术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转换为社会财富，必然会影响主体热情的高扬和自觉，导致对专业价值的怀疑。那时候高校考评体制还是传统学术型体制，青年教师如果不能顺利出版著述，其职称评定、福利待遇以及社会评价都受到影响。我在1993年策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之上，所谓逆风行驶。我当时就想试试，到底是读者真的不欢迎文艺批评，还是出版社被市场经济大潮吓慌了手脚而不肯作为？我与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们一起分担了这个实验，实践下来的结果是好的，书虽然有了一些经费补贴，出版社不至于亏损，但是销售和宣传的结果，反而有所盈利，《文丛》最后几本的出版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我比较看重的是这套丛书里几位青年批评家的著作，如郜元宝、张新颖、王彬彬、罗岗、薛毅等几位青年才俊的论文集，如果说，这套丛书多少为作为全国批评重镇的上海批评队伍建设做过一点贡献，也就是不失时机地稳定了这批青年评论家的专业自信。后来几年里我又策划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山东友谊出版社），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的意义还是超出了我当时的期望，不仅仅是对几位青年朋友产生影响，也不仅仅是对上海地区的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续小强先生在二十年之后还想借重这个出版品牌来推动青

年批评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之一。不过如我前面所说，现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问题并不相同，批评的处境也不同。现在，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特别困难。那么，今天的困难在哪里？我个人以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编辑“火凤凰”的两个宗旨中的一个：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

这是我的愿望。写出来与青年批评家们共勉。

陈思和

2014年3月3日于鱼焦了斋

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1] ——致黄平

001

黄平兄：新年好！

是时间过得快，也是我动作真够慢。一快一慢，一晃，三年。

更准确地说，这封信拖一年半了：起初，作为你那篇有关路遥论文的第一个读者，我读得来劲、觉得有话要说，于是，起意要好好给你写封信；现在，我又读到了你谈韩寒、郭敬明的最新作，好像可说的话就更多；而且前两天我静下心来，读了（不少是重读）你的七八篇文学批评，从关于《废都》的“人”与“鬼”的纠缠，到你最近谈论《蜗居》与“中国梦”。既如此，我还是从最初读你的文字、从《再造“新人”》谈起，因为，你的导师程光炜先生讲得好，“这篇文章正是一个很好的起点”^[2]。

或许是《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3]一书深远的“影响的焦

[1] 此文系《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专辑文章之一，原载于《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2] 程光炜编：《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3] 该论文集1993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思想和学术影响，仍然值得专文论述。就“社会主义新人”这个话题来说，该书编者唐小兵的《〈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一文，尤其重要，该书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224页。

虑”，或许是我们这些1960年代后期出生者的历史记忆，我一直对于“社会主义新人”问题抱有很大的研究兴趣。无论是作为后发现现代化的国家，还是作为列宁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国度，“新人”，或者说革命和建设的“主体”问题，始终是“现代中国”及其文学绕不过去的焦灼所在，也是曾经的巨大希求所在。在此，20世纪的中国有许多气宇非凡的实践，也有太多刻骨铭心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细嚼慢咽。所以，当看到你在“重返八十年代”的途中竟能找到这里，我不免有些吃惊。因为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社会主义新人”再起波澜之时，你这个“80后”还没有出生嘛；更重要的是，如你的文章一开头所言，我们熟知的八十年代文学叙述里，从“伤痕”到“先锋”这一脉络基本上成为文学史的“共识”了。

002

我不得不说，真应该感谢光炜老师带领你们这个团队，认认真真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现场，实实在在地重读当时的文学文本和文学事件。许多事，在摊开来看了之后，是那么清楚明白；许多知识，在“考古式”地批判性阅读之后，是那么昭然若揭；而你，在重返和重读的过程里，没有像近年来的不少贗品“史料学问”那样，或被太多的材料看花了眼，或捡了个芝麻就自以为西瓜，却独独以此“新人”问题作为自己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起点，实在是有过人之处！这其中，一大部分的原因，我想，你那文章结尾的抒情段落已然回答：“当代文学是否正在面对着价值层面的崩溃？是怎样的历史机制，使得纠葛的欲望、幽暗的心性等等被指认为更‘人性’的或者说是更‘真实’的？面对一个疯狂的时代，在汹涌的欲望与名利的诱惑的包围中，文学界能否从容地坦然面对，持灯穿越茫茫的暗夜，传递感动、幸福、温暖以及不苟且的尊严？这一系列问题或许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如何更为公允地接受现实主义的文学遗产，以及更为审慎地分析当代文学的‘规划’及其激烈的‘博弈’，召唤着我们重返八十年代。‘历史’的进程曾经将‘八十年代’推移、封闭、遗忘，但始终无法终结，一切或许才刚刚开始。”^[1]

[1] 黄平：《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调整及影响》，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你真是回答得足够好，我都忍不住做了文抄公。我的意思是，坚决地立足当下，立足于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尤其着眼于今天社会及文学的匮乏和缺失，构成了属于你的文学批评的重要特点。

因此，后来在《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这篇纯正的文学论文里，读到如下注释，“在笔者写作的同时，黑龙江鹤岗矿难爆发，108人死亡。在《南方周末》（2009年11月26日）关于黑龙江鹤岗矿难的报道中，矿工们说：‘我们虽说是国有矿，也算国家职工，但都是计件工资，没有保底，按照每掘进一米给几十块钱，瓦检员平时险情都是瞎咋呼，一来就撵人，问题是矿上才不管你啥原因干得少了，你干多少米就给多少钱。’”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吃惊。而要是有人拿所谓“学术规范”来这里规范你，我倒会“相当”吃惊，因为，假如良知和信念是这年头的稀罕物，那么当代批评之中，道德激情，就不是“可以有”的问题，而是其第一要义。我注意到，“在笔者写作的同时”这个句式，仿佛已成了你的文字徽记，而且，也正是这种感应和批判现实的能力，事实上，格外擦亮了你发现问题的眼睛。比如，在解读郭敬明《小时代2.0》的过程中，如果不是“我爸是李刚”事件的爆发，如果不是对此有足够的敏感，那么，你很难从那二十来万字中，慧眼独具地拈出“这车是我爸的”这句听来很普通的话，也就谈不上紧接着接下来的精彩分析了：“‘改革’开始变得像混凝土一样凝固，既得利益像遗产一样在家族内部承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梦’不是‘破裂’，而是‘断裂’，对于一部分青年如此轻松，对于另一部分青年却过于艰难。”这里，你惹人眼目地引用了自己曾经的批评文字，而我，很能够理解你这里的自我征引，因为这段话，与其说是你写作《〈蜗居〉、新人与中国梦》时第一次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你这些年来一直响动在心里的声音！

希望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因为我觉得，批评和创作一样，都是表达，或者一个显得时髦的词语——“表征”。表达自己，包括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并没有错，这样的年代，许多人（不仅是批评家）实际上都在这么做，只不过更多人（尤其是许多自诩的“超越型”知识分子）不承认罢了；当然，有错，那也是很可能的，那就是错在“自己”

本身太小了，是所谓的“一己之私”。这大概也是“Representation”这个能指的优势所在吧。批评和创作一样，在我看来，都是“自己”的“Representation”——“表征”“表达”“表现”“代表”乃至“抗议”，而这个被“Representation”的“自己”，并不简简单单地是所谓封闭的、潜伏在内心深度的“私己”，而一定是各种力量、各种社会关系的构成物；而且，这个“自己”，总是一个“代表”，至于自己代表了谁，可能自觉，也可能不自觉。

我想，近期你如此投入地研读不少学院派不屑的《蜗居》以及郭敬明、韩寒，你是越来越自觉地认同“自己”的身份了：你是一个“80后”，一个“80后”的文学博士、大学教师，一个貌似“80后”之佼佼者。——网络语言的这个“貌似”真是妙，“貌似”，既“是”又更“不是”，哈哈，还是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吧，是这十来年以“高房价”为象征的有形无形力量和“超稳定结构”，挡住了如你这般有为青年通往“社会精英”并实现“中国梦”的路，使你成了个应该“三十而立”却无以“立足”的“80后”。“房子”，在此是个象征，我也知道，“房子”对你（以及你们这一拨人）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实在，“无房”故而“无以立”；而你，尤其是你的文学批评，越来越自觉地成为这些“80后”的一个“代表”了。

这不是坏事。在我看来，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在现实感、道义心的基础上“表征”“自己”：“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所说的这一切，都还没有过时。我甚至认为，你与其继续研判“知青”或“先锋”们的创作，进行当代文学的学科研究和建设，还不如更多地关注当下，关注当下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关注当下的流行文化尤其是青年亚文化现象。因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我们虽然已经呼唤了

[1] 参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2页。

许久，也尝试性地开了些头，但如今，是你们这一代人，才能对这个“短暂的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特别是其最纷乱也最活跃的部分，诸如媒体、网络文化等，有更身体性的敏锐、更贴身切己的关顾，以及我所期待的更同情性的批判。记得几年前，李陀老师在认真的闲聊时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是“当代中国的别林斯基”。

更深地卷入当代批评！在听到这样一个建议的时候，想必会引起不少善意的担心，甚至也还有可能来自于你自己。一方面，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统合的知识界不复存在，越来越歧异的思想资源、现实立场以至写作趣味，或明或暗地呈现于文坛和批评界，各种话语的较量即使不说刀光剑影，也可谓此起彼伏；比起安稳也安全得多的学院和学科研究来，当代批评的场域，其实更配得上蔡翔老师所说的“战场”^[1]——这个词乍听一下，有点耸人听闻，事实上，“文学战线”，我们曾经那么熟悉；只不过，在“去政治化”地“被另外一种政治”收编了之后，“文学”及其“批评”，不仅是对外的“战线”，更是内部纷争、竞争的“战场”了。要更深地卷入当代批评这个是非之地，习惯了隐忍、谦卑的你，势必要舍得自己的“统一战线形象”，势必要补给现代中国的历史资源和当代理论的思想能量，势必要拿出更强大、更坚韧的战斗力。另一方面，随着文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作家与批评家的品牌化，“你懂的”，当下的书商系统和媒体力量已使批评界运作着太多“名利场”的规则；在这样一个普遍匮乏的年代，漂浮着的诸多欲望，跳动在许多貌似唾手可得的诱惑面前，批评者还能守持多久，又能否把守得住？况且，在这样一个媒体时代，什么都说得、什么都捧得、又什么都灭得的“意见分子”，不是已经司空见惯了吗？怎么还把你向当代批评这个既是“战场”又是“名利场”的火坑里推？呵呵，我的回答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事实上，既往的批评实践，让我对你不会轻易沦为“意见分子”有太多担忧。何谓“意见分子”，且让我转述个段子：变动不居、变

[1]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幻莫测的当下中国，几乎每天都有奇人妙事发生，几乎每天都是酸甜苦辣杂陈，你只要打开报纸或网络，每天在接收海量信息的同时，就必然撞到一份份相关评述和意见书。什么意见呢？没那么重要，因为绝大多数意见，都不难想见；谁的呢？那就更不重要了，因为那么些意见，总是在轮流周转之中。于是，重要的是，意见分子们，不能不上场亮相、不能不发表意见；最重要的是，意见分子们，各自是几点开始奋笔疾书？谁起床得晚、谁写作得晚，那就是谁，写得——最生猛、最犀利、最那个啦。道理很简单，那些容易想到的意见，早已被捷足先登者表过态了，起床晚了，再不写得狠一点儿，那还怎么能吸引眼球、让粉丝知道自己没缺席盛宴？

006

看到这里，或许，你会有一点心理波澜么？我自己写到这里，就忽然来了点自我怀疑：不完全是怕我对你的估量尤其是期待显得过高，而是我们期盼的“当代中国的别林斯基”与那些活跃在当代批评中的“意见分子”之间的界限，实在是微乎其微、存乎一心，稍不留神，就会滑了过去，万劫不复。虽然，我那些对你的期盼，仍然有自己从你那里读来的理由：你的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从重返八十年代起步，二三十年前的那些文学材料培养了可贵的历史纵深感，从《今天》杂志看“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你读出了当年两种不同的“新人”规划的交锋，直至近期读作品，“新人”形象的演化和蜕变问题，你依然一以贯之、挥之不去，多么难得的大局观和问题意识！这，应该有助于避免“意见分子”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化”习性，而可能把具体问题放在语境脉络里、放在社会结构里，予以充分的“历史化”和“表征化”；不停留在“愤青”式的批判或“药方”式的应对，而是在复杂的历史分析基础上，直面“难题性”并形成某种“诊断”，说出所有的盘根错节并艰难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自己的声音”不那么响亮，听起来不那么鲜亮无比，却也非要有真正学人的态度和专业的精神、素养不可。

那么，我的担忧何来？我的担忧，又恰恰来自于你的优点、你的能写多产、你貌似专业的优势！对不起，我又一次让你“貌似”了一

回。因为，比方说吧，文本细读的功夫，你就倚重得有些过分，而且你的文本细读本身，颇也值得细读一番。讨论郭敬明，你发现他很喜欢用“宇宙”“星球”“世界”“世纪”这类大词，“以极大的比喻，写极小的情感，凭借这种巨大的张力，不断强化‘我’的重要性，其作品的核心是一个高度自恋的‘自我’，无限膨胀，世界不过是围绕‘自我’旋转的幻象”，借此，你打开了郭敬明文体的“魅力”与“秘密”，这诚然是你基本工作方法论的生花妙笔。还有，当年的那类“新人”叙事，你发现了一个模式化的核心线索，革命青年在“现代化”的号召下从“革命小将”转变为“专业能手”；近年的《蜗居》，你能从海藻与宋思明的一处“性交易”细节读起，丝丝入扣，出人意表而又合乎情理；在《平凡的世界》小说文本中，你查出《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可能是本“不存在的书”，那许多读者的调查报告中，你看出了共性的“励志型”读法，等等。你的文本细读，显见得丰富多彩，既有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也有文本细节的象征化解读，甚至还有作品素材的史科学考据。一句话，文本细读，正构成了属于你的当代批评的另一重要特点。既然如此，我多么希望自己的担忧显得多余啊。

可是，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还是关于《平凡的世界》。你在论文里精读了小说中一个段落：孙少平从煤矿到省城看望妹妹兰香，感到了自己对妹妹的陌生，“这就是他那个吊着泪珠、提着小筐筐拾柴火的妹妹吗？他似乎都不认识她了。不知为什么，他感到眼窝有点发热。他为妹妹的成长感到欣慰。她也许是家族中的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由此，你得出了文章堪称最重要的一个结论：这里，少平的“执拗”显示了他和传统黄土地的悲剧性关联，他始终不肯被驯服，不懂得放弃“落后”来与“先进”接轨；而也是这里，作家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在少平与兰香这种深刻的差异性之间，本来可能产生爆破性的张力，撕裂‘新世界’的幻觉”。——细是真够细的，结论的放大效应也特别显著。不过，带着记忆和直觉的某种怀疑，我查找了《平凡的世界》，好啊！少平的那段心理活动，在“她也许是家族中的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之后，紧接着还有非常关键的几句：“妹妹的这种

变化，正是他老早就对她所希望的。在这一刹那间，他自己的一切不幸都退远了。为了有这样值得骄傲的妹妹，他也应该满怀热情地去生活”！这不是为了指陈你读得不细，也未必是要暴露你故意的遗漏，甚至也不是要全然否定你那结论，而是，这个例子虽有些特殊，却更深刻地表明，你的文本细读——总难免是从某个整体的观念出发来细抠文本，而很少真正地源自文本细节的“洞见”，来照亮一个被遮蔽的命题乃至世界，从而开启全新的问题域以及可能性。的确，应该承认，我以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式的高度来衡量你，是有些苛刻了。然而，仅就这个段落而言，认真地细读，并不难见出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的微妙乃至暧昧，而如果读出了比你的想象复杂得多的路遥，那么，八十年代文学以至历史的重返之路又将如何？或者说得简单一点吧，你的这种文本细读，是不是某种主题先行？

更吃紧的是，由于你特别擅长文本细读这一技术，特能将既有观念一板一眼地镶嵌进文本，特将自己的思路笃悠悠地细读铺衍成文，于是，在有了一套较完整而自洽的想法之后，阅读和写作的真正挑战性、思考 and 问题的真正难题性，都可能在阅读、思考和写作的过程里，鬼使神差地滑门而过。应该说，你现今的许多大想法，诸如，要将“文学”与“改革”历史尤其是那些重大转折关节联系起来解读，“当代中国正呈现出高度的文学性，其戏剧色彩与荒诞程度，令人叹为观止”^[1]，当代中国正催生着“白领”的“贫困化”，这将使原来中产阶级意义上的“中国梦”濒临破产^[2]，等等，在当代批评的场域，都不乏过人之处；但我更得说，任你再领先、再高明的思想，也经不起多久的原地踏步，在这样一个“意见分子”遍地跑的年代，更经不起几遍重复，就耗能量了。那么，更进一步，假如“道德激情”降为某种表态以至于姿态，假如批评不足以让中国“掷地有声”，假如写作不再是为了“表征自己”，或者，假如那个“自己”

[1] 黄平：《“中国故事”的讲法——以2011年春晚为例》，载《天涯》2011年第2期。

[2] 黄平：《在中国梦的断裂处重建对“改革”的想象》，载《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8期。

实在是太“小”了，假如你终于有了“房子”，假如你侥幸地成了“社会精英”，假如你游刃有余在当代批评的“名利场”里……好了，不能再“假如”了！

我知道，我的意思已经很清楚，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我期盼“当代中国的别林斯基”！然而，这，不仅需要立足当下的敏锐和道德感，也不需要专业能力和种种批评技巧，甚至所谓的“立场”或“技术”；如果使用不当，其结果还往往适得其反。这，真是一道“窄门”，一道“过不去正常、过得去才不正常”的门。然而，你懂的，我们应该减负瘦身（减什么？你懂的！），应该加足马力（加什么？你懂的！），去试一试，真的，去试一试。

我也知道，这封信头重脚轻，甚至多少有点“精神分裂”：我的拖拉和“害怕写作”^[1]，使之混合着多个既关联又不同的动机；你的高产及旺盛的创作活力，让我好生羡慕乃至嫉妒，当然，也真不免有些担心；而我那些不满足和不满意，仿佛还真不是对你一个人说，确乎更多的是写给我自己。

这样的年代，批评何为？批评是“微暗的火”！因为是“火”，所以给人光亮，令人警醒；又因为“微暗”，颤颤巍巍，所以尤其难能可贵。不要任其自生自灭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愿我们共勉，并且，勉力为之。

倪文尖

2011年2月，农历辛卯正月

[1] 语出黄子平：《害怕写作》，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辑一 幻城突围 / 001

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 / 003

个体化与共同体危机

——以“80后”作家上海想象为中心 / 034

“大时代”的文学现状

——怀念巴尔扎克 / 056

郭敬明的“幻城”与“宿命” / 060

郭敬明：历史的孤儿，物质的病人 / 066

安妮宝贝：大时代的局外人 / 069

“女性向”文化：《步步惊心》与穿越小说 / 075

《风起陇西》：“一曲忠诚的赞歌” / 080

《量子江湖》：后新武侠的诞生 / 085

源自虚无：评《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 / 092

江湖的秩序

——《神雕侠侣》阅读笔记 / 098

辑二 文学立场 / 103

类型文学与现代生活 / 105